·文学专业·



A SERIES OF BOOKS OF SUPERIOR MASTER THESES OF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南京大学卷

丁 帆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统　筹　丁建元　　责任编辑　徐宝平　　装帧设计　池　骋

A SERIES OF BOOKS OF SUPERIOR MASTER THESISOF FAMOUS UNIVERSITIES OF CHINA

ISBN 7-80642-970-0

9 787806 429709 >

定价：26.00 元

G643.8
10
:2

A SERIES OF BOOKS OF SUPERIOR MASTER THESES OF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南京大学卷

丁 帆 主编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南京大学卷/丁帆主编．—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11
ISBN 7-80642-970-0

Ⅰ.中… Ⅱ.丁… Ⅲ.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汇编 Ⅳ.G64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100 号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南京大学卷

丁　帆　主编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www.sdpress.com.cn
地　　址：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总编室（0531）82098755　82098756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170mm×230mm
印　　张：17
插　　页：2
字　　数：210 千字
定　　价：2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目

文学“情感”观照下的人道主义多重性
——关于“五四”文学人道主义的反思 …… (1)

穆旦40年代诗歌特质研究 …… (69)

论王小波的自由意识及其中国现代
“自由主义传统”的关系 …… (125)

乡土中国的世纪末解释 …… (191)

文化精神的柔性镜像
——新时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他塑” …… (23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学“情感”观照下的人道主义多重性

——关于“五四”文学人道主义的反思

姓　　名:2000级硕士生　何同彬

专　　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教师:倪婷婷　副教授

目录

导论 …… 5

第一章 道德 文学 情感
——关于“五四”人道主义文学
的起点 …… 10

第二章 “五四”道德失序的时代境遇 …… 19

第三章 “五四”人道主义思想的困境 …… 33

第四章 “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表现 …… 48

结语 …… 64

参考书目 …… 67

导 论

现代性起源于一种“断裂”，这种“断裂”从寓言的角度来看，更像是打开了一个倒置的潘多拉的盒子。摆脱宗教和形而上学束缚的世俗化进程，最初所怀有的理想和希望，在经历了预设的和目的的、持续进步的时间观念引导的种种努力之后，开始不断面临批判和反思的质疑。“断裂”造成的流血、眩晕和迷失开始凸显。在现代性的开端，人的主体性在启蒙所呼吁的人性觉醒中成长，在前现代被认为是蒙昧的“人”，开始以理性、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等价值进行重塑。但是现代性的批判性实现了与传统的“断裂”之后，又不得不催生一种反思性，因为现代性的人性想像与它的具体实践又形成了新的“断裂”，解放了的“人”开始独立面对前现代所没有提供的更多的“非人”的境遇。后现代的所谓“人死了”、“作者死了”、“读者也死了”、“主体的零散化”的极端表述，并非是真的把对“人”的思考从思想和文学中剥离，而是对一种现代性的乐观的人本主义中心的反拨。以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来看，当下“‘五四’思想缺失”、“‘五四’并未完成”、“重回‘五四’起点”的种种争论和呼吁，实际上都是对现代性的历史目的论的否定，是人性从启蒙激发的“英雄化的意志”（福柯）回归平静后的无奈的选择。“五四”时代对“人”的唤醒，实际上是由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的想像机制，形成的一种抽象的假定性“唤醒”，普泛性的人性无非是在“断裂”后面临激进的历史进程形成的种种困境，而所谓的“人”的进步在当下人性迷失的状况里，只能构成对现代性的人性重塑的反讽。

在现代性的启蒙观念对“人”的价值重塑之中，文学的“历史化”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文学的历史化表明文学与社会现实构成一种特殊的想像关系，通过历史化，文学使社会现实具有了可感知和可理解的形式和意义，并且使自身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历史化问题不只是关于文学如何建立自身历史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关于文学如何使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具有了‘历史性’，如何以历史的观念和方法来表现人类生活。”[①]可见，文学历史化的目的和

①陈晓明等：《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22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文学主体自身强烈的表意焦虑有关，他们试图成为现代性历史叙事的创造者，成为改变甚至主导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结果，中国现代文学被“历史化”为现代性的意义表达，即使得它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宏大的社会能量、表现出空前的思想力度和现实震撼力，也使得它逐渐异化为历史理性单纯的工具、沦为革命话语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这种过度“历史化”，在“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立人”目的之中虽然还没有得到显著的体现，但“五四”启蒙的思想局限和当时的文学特征都预示着文学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复杂的历史进程，成为激进的社会变革的牺牲品。人道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人性想像建构的一种价值观，在“五四”文学的人性觉醒中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成为当时文学思潮中的主流，是所谓“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等文学观念的价值主体。但在文学的过度“历史化”的表述之中，人道主义不得不发生着范畴和阐释的变化，其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脆弱性逐渐明晰起来。“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②]“五四”初期，周作人对文学的人道主义表现的这一定义，尚具备明显的文学本体的追求，“个人的感情”、“艺术的方法”、“影响于人间幸福”都是最为朴质的文学本位的思考。但是“偶像的破坏者”们，在被解放了的扩张的“人类的意志”的引导下，很容易把最初起源于“同情”的人道情感抽象为一种表达信仰和意志的“新宗教”。所谓的“新宗教”并不是一种代替传统儒教伦理的新的形而上学系统，而是暗示着“五四”思想走向中潜在的背叛理性的种种理想主义的冲动。“五四”启蒙的“立人”目的是以批判“旧道德”对人性的戕害为开端的，传统中国的道德理想与伦理中心的“旧道德”面临现代性的“新道德”的猛烈地批判，但是现代性道德的显著的目的论色彩，使得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权威主义的危险。所以，最初所具有的明显的道义、道德的伦理承担，决定了“五四”的人道主义不可能总是保持一种朴素的道德情感的“同情”和“博爱”，而是在现代性激进的历史进程中，随时面临新的权威主义

②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见《周作人自选文集·艺术与生活》，22~2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话语的使用和置换。文学的“历史化”使得“五四”就开始的文学的人道主义表达，与道德伦理观念等现代性的社会变革纠结缠绕在一起，后者对前者逐步狭隘的意识形态化影响，导致人道主义丧失了启蒙之初相对稳定的价值内涵和情感基础，成为一个被各种话语力量操纵用以参与历史进程的“符号”，其“立人”的价值指向也在摇摆中形成必然的自反性。“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觉醒、革命文学的人道主义批判、毛泽东《讲话》里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阶级界定、50年代的“文学是人学”的人道主义讨论及被批判、“文革”整体性的反人道主义、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复苏、80年代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的争论、90年代的人文精神的忧虑、当下文学主流的人道主义退场……这样一个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复杂衍变，告诉我们现代性的人性建构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人道主义的文学表述也不可能是一个随意褒贬的简单性命题，而是一个需要具备多重性视野进行观照的复杂性命题。

所谓的多重性视野并不是在一个逻辑层面上展开的逐步深化和变异的过程，而是现代性遗留的破碎的思想图景所提供的诸多理性和知识的累积、纠缠、分歧、反思。所以，多重性的揭示不是一种新的系统性的学术构想和价值判断，而是重在强化一种对现代性的破坏性和人性重塑的失败的认知。分析人道主义与现代道德伦理建构的纠缠、梳理人道主义概念的丰富性、厘清它与“人文主义”等概念以及广阔的西方思想史错综复杂的关系、重视“五四”文学人道主义异化的微妙的内在脉络，这种种努力的目的是去打破20世纪中国文学人道主义判断的简单化倾向。以此进一步深化，凭借深刻体察现代性人性塑造的复杂面貌的宏观视野，重申激进主义之外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对传统和现代的延续性的尊重中，保留的对永恒人性的某些价值的信心和热忱，从而重新强调文学“历史化”中丧失的文学本体所应有的对普遍人性的关怀和抚慰。这种文学本体的强调，并不回避“五四”以来人道主义的文学叙事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功能。福柯“倾向于认为启蒙与人道主义不是处于一种同一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他的依据是“人道主义依赖于从宗教、科学和政治学中借来的人的概念”，而这“是与具有自主权的我们自己的批判和永恒的创造的原则相反的：这个原则处于启蒙本身所拥有的历史意

识的核心”。所以，他继续讲到，“无论如何，我认为，正如我们必须从‘支持或者反对启蒙’的敲诈中解放我们自己，我们也必须从将人道主义和启蒙的问题糅合在一起的历史的和道德的混乱观念中逃离出来。”[③]福柯虽然深刻洞察了启蒙与人道主义的紧张状态和人道主义的历史性背负，但他逃离“历史的和道德的混乱观念”的想法只能是一种空想。正如他自己这样定义现代性：“现代性经常被刻画为一种时间的不连续的意识：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眩晕的感觉。”[④]“断裂”和“眩晕”无法保证“逃离”不变成一种逃避，历史和道德的混乱对现代性而言恐怕已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痼疾。所以本文虽然以文学本位为指归，但却不回避人道主义的必须的道德承担。作为启蒙历史意识核心的所谓“批判和永恒的创造的原则”，并没有把人道主义等现代性道德整合成为超越传统道德的新道德，人们对人道主义的热情沦为巨大的创痛和失望。“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人实际上用了几个世纪的黄金时光，用几代人的智慧和生命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而昂贵的人道主义实验。实验的结果报告单上赫然写着：人道主义惨败！历史终于告诉人道主义：它为人们描绘的蓝图，它对人们许诺的理想，不仅是无法实现的，而且是往往与人自身作对，它为人们指明的美好途径，不仅无法走通，而且恰恰魔术般走到了其目的的反面，不是吗？每个‘个性’的‘解放’变成了人们孤独的坟墓和他人的地狱。人的理性的张扬得到的不是在世界中的自由，却是社会束缚人的重重规范、秩序，是内在的公式化、程式化的刻板生活，是机器对人的异化。”[⑤]所以，文学如果还要为拯济人心做出努力的话，就不能回避道德混乱对人性的困扰，以及混乱后的人性对回到完整性的渴望。本文对人道主义的反思不同于后现代对人道主义的反对，我们仍然主张在文学中表达人道主义，仍然希望文学的人道主义能够帮助道德从混乱中恢复传统道德性目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希望人性在文学之中获得安宁和从容，而不是以“深刻”为表征的种种分裂。因此，反思“五四”文学人道主义的目的不是取消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感，而是认为这种情感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吸纳诸如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等人文观念的内在调整。同时，我们绝不回避文学的道德功能和道德承担，在现代性的道德废墟和后现代取消道德严肃性的语境里，甚至要重申和呼吁文学

③[法]福柯：《什么是启蒙？》，见《文化与公共性》，436页，三联书店，1998。

④[法]福柯：《什么是启蒙？》，见《文化与公共性》，430页，三联书店，1998。

⑤程文超：《百年追寻》，2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在重建道德中的理性的参与意识。

当然，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反思性视角，它需要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不是一个历时性的起点，即不是简单地回到某个特殊的历史语境，而是一个价值还原的起点。这就是本文选择“情感”的原因，是为了对抗文学的“历史化”的“反历史化”的努力。80年代以来的几个典型的文学史书写，都明确表达了颠覆中国现代性进程对文学本体和文学主体的过度影响的倾向。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等观念，往往都强调文学自身审美功能的独立性，都倾向于以“现代性”的整合价值打破原有文学史解释结构的非文学性压迫。当然，现代性在此起到的作用不应该侧重于抽象的整合，那样将重蹈宏大叙事的覆辙，而是要充分挖掘它内在的反思和质疑的功能，规避强烈的僵硬的意识形态色彩，把“断裂”的现代性征候当做一种无法避免的境遇进行深入地思考，以此还原文学发生、变异和变革中的生动的文本体现和文学主体真切的感受。但是，现代性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种文学本位的努力吗？“还原”、“回归”总是带有现代性制造的特有的怀乡的兴味，实际上是试图弥合种种断裂造成的文学迷失和人性迷失，正如几年前关于“纯文学”的论争一样，只能仍然是理性和知识提供的一厢情愿的虚假的视角。同样，关于“五四”人道主义及其文学表现，以“情感”为起点的观照，除了使得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之外，并不试图建立可以重新阐释一切的系统性的学理结构。对本文而言，恢复文学“情感”的人道主义直觉，在对个体、生命、爱、自由的朴实的眷恋的立场上，不放弃文学特有的关怀，立体地显现人道主义的多重性所造成的复杂的文学面貌，是我们的主要构想。可是，我们只有将这种构想放置在“五四”的道德失序及其形成的特殊的人道主义观念之中，才能在分析“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特征时不至于漫无边际。但这一过程必然呈现哲学的、历史的、道德伦理的视野的多重，人道主义及其相关概念历史性的多重，以及由此引申的价值判断的多重，那我们依靠“情感”起点的文学性还原不是仍然会在非文学的纠缠中丧失属性吗？如果从广义上看待这种“多重性”，看待这种还原又无法还原的尴尬境遇，我们是否会对现代性以来文学的存在生态、对“五四”文学评价的现有的分歧和争论，有一种新的认知视角呢？

第一章　道德　文学　情感

——关于“五四”人道主义文学的起点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认为：“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⑥]依据于文化认知和个体经验的这一伦理判断，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几乎是一种共识，它决定了“五四”启蒙把伦理道德观的变革，即“道德革命”，看做是首要的任务和根本的追求。晚清以来的社会裂变，早已瓦解了儒家伦理中心和道德理想所依据的农业经济、家族社会和专制政体的稳定结构。延伸至“五四”，启蒙所倡导的现代伦理与封建宗法伦理的对立更为紧张，彻底摧毁后者的思想潮流，进一步激化了近代以来已有的道德失序。失去“共同体”的传统德性的内在规定性以后，现代性—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伦理学高蹈，但这种人为思辨、缺乏规范依据的道德，企图用简单的、理想化的价值原则去框套复杂的现实生活，其设想的结果必然变异。更何况，“五四”并不能完全摆脱传统伦理阴影的制约，这导致它接受和倡导的现代性伦理有着内在的缺乏，道德观念的混乱进一步复杂化。人们用以思考、评价、批评的道德语言指向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但却无法通约、无法理性地论证。虽然原有的道德统一性已经丧失，但原则的非理性、个人化、情绪化，却被另一种理想的、脆弱的统一性吸纳，新道德借取启蒙的思想资源，却在某种意义上还魂了传统伦理的威势，它遮蔽了一切异质和冲突，导向另一种似乎能解决一切传统的道德痼疾的新的权威——“革命伦理”。历史证明了，“革命伦理”的道德理想国其实制造了最大的不道德，新道德重新沦为一种空想。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在感受着一种道德缺失后的混乱和迷惑。此时，再回头审视“五四”时期人们在讨论某个伦理问题、道德问题时的同一和分歧，就会发现“态度同一性”（汪晖）后面是各种不同观念的矛盾冲突：个体的伦理选择与制度伦理的问题、高层次道德与基本道德的区分、世俗的道德直觉与高调的理想主义伦理、道德的力量与政治的力

⑥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量的混淆、反对旧道德与无法摆脱的如影随形、提倡新道德与引发的革命的道德复仇……这种道德伦理的多重性和歧义丛生，在以往对“五四”的伦理道德观的判断中往往被忽视。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道德伦理变革，从一开始就与文学革命纠结缠绕在一起，它的多重性实际上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表现。

1932年，胡适曾在一次讲话中谈到陈独秀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三大贡献，其中第二个贡献是“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⑦。从《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的比较中，我们确实不难看出，陈独秀二元对立模式后面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强调，对文学的伦理、政治特征的深刻洞察。但是如果撇开政治，在强调文学的伦理道德的表现上，胡适以及其他文学革命的参与者的作用并不比陈独秀小。1918年是新文化运动集中向传统伦理道德观发难的一年，鲁迅《狂人日记》和《我之节烈观》的发表、胡适对《娜拉》和“易卜生主义”的译介、关于“贞操问题”的大讨论、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表，显示出“五四”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了浓厚的道德叙事的倾向性和自觉性，也说明“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⑧。“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⑨所以，在对“五四”文学进行研究的时候，强调审美属性的“道德判断悬置”的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它与历史的纠缠已经剥夺了它大部分的独立性，而道德伦理观念的更新和混乱也都同样渗透在它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思想之中了。那么“五四”文学最集中和鲜明的道德叙事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⑩胡适的这一概括是合理的，但总体而言，后者即“文学内容的革新”显然更为引人注目。“五四”文学革命虽然得益于语言工具的解放，但它并不真正关注文学的工具性本体，为了响应启蒙思潮对“人的觉醒”的强调，建立以“立人”为目的的“人的文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主要的文学思潮。而“人的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内容的体现，则是“人道主义”思想的盛行，这也成为当时比较鲜明的文学道德叙事。

⑦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见《胡适文集》(12)，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⑧[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9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⑨周作人：《人的文学》，见《周作人自选文集·艺术与生活》，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⑩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人道主义虽然来自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后来的启蒙思潮，但在“五四”时期，恰恰是它既能承接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又与人的觉醒与解放的现代性吁求相融合的特征，才使得它风靡一时。也就是说，人道主义的中国语境的传统因素，势必会影响它形成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宗教意识的“新宗教”（周作人），并在“五四”不可避免的启蒙缺失中凸显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消解人道主义所应有的理性的伦理建构和朴素的道德直觉。而历来的关于“五四”的人道主义的评述，常常囿于一种明显的简单化思维的特征。无论是对“五四”总体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评价，还是对“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特征的分析，要么高度赞扬（只做简单的区分和“伟大”或“浅薄”的评判），要么以“越位”和“异化”之名否定（遵循从民本主义到人道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或民粹主义的逻辑）。两种思维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同样都有着对人道主义情感特征“同情”、“关怀”和“博爱”的复杂体现的忽视。关于“情感”，在对“五四”的研究中，尤其是思想方面的研究中，往往被认为是启蒙破产的“症结”之一。“‘五四’启蒙主义也标举‘理性’的旗帜，然而‘理性’一词如同‘科学’、‘民主’一样是以对于传统文化和人格的挑战者和控诉者的面目出现的，它没有或者主要地不是体现在‘五四’启蒙思想的方法论之中。因此，当‘五四’思潮在‘态度的同一性’的支配下形成一个历史运动时，它的情感性的思考较之理性分析更深刻地表明了这个思想运动的特点。”[11]在这一逻辑之内，“五四”思潮的这种“情感性”特征，一方面导致“五四”时期许多思想家和文学家受个人经验和情感体验的限制，“陷于传统的世界和偏执狂的世界之间，各以自己的方式陷入混乱”[12]。另一方面，“五四”思想的“整体性”“体现为一种未加逻辑分析的意识形态，一种在理性旗帜覆盖下的感性的力量”[13]。在另外一种关于“越位的人道主义”的论述中，“人道主义，很快湮没在社会主义的操作理念里，20世纪的思想先驱走了一条逆人道主义而行的道路。这是他们当初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这一切都源于那点可怜的爱！”[14]这种理性的反思性思维，有助于从学理上说明“五四”启蒙思想何以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思想体系，从而为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但是这种理论的抽象化，实际上只是依据不断更新的思想资源做出的想像

⑪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见《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42页，东方出版中心，2000。

⑫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见《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4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0。

⑬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见《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44页，东方出版中心，2000。

⑭张宝明：《越位的人道主义：“五四”启蒙残缺性的再反思》，载《文史哲》，2002(1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